

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 110 周年

——质疑“文明探源工程”

裴安平 (www.peianping.com)

考古作为大历史学分支，妨碍学科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见物不见人”。苏先生对中国考古学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见物”又“见人”的思考与理论总结，并奠定了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今天对苏先生最好的怀念与纪念就是不断地思考、创新与进取。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在绚丽多彩的考古发现的掩盖下，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泡沫满天飞。

二大泡沫：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

其中，“文明探源工程”有五小泡沫：神话国家、神话考古学文化、杜撰区域聚落形态、杜撰酋邦、神话社会分工。

第一章：质疑“国家”的神话

王巍先生说：“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但是，文明与国家完全是意义不同的概念，起源与发展也互不相同。

文明是人类社会高品质的发展状态和发展阶段，也是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本身的解放不断的进步与变革。不因国家而起，也不因国家而亡。国家只是人类地缘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与组织形式。以前没有，以后也会因为世界“大同”而消亡。

人类历史可见二个生存状态存在重大区别的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自然社会，即主要是自然因素主宰和制约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

第二阶段，文明社会，即主要是人类社会内在的力量主宰社会发展的阶段，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到今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主动追求主动改善生存状态与生存质量的阶段，即社会的文明化阶段。

在国家出现以前，“文明”的阳光就已和谐地洒满了人间，后来在国家出现的地方又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后来国家虽然消亡了但文明还在延续。

考古表明，距今 6500—5000 年国家出现之前文明起源就给社会带来了 8 大变化

变化 1：自然的广谱经济转变为人为的生产性农业经济。

变化 2：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转变为早期个体劳动。

变化 3：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开始普及。

变化 4：个体家庭成为了血缘社会独立的最小组织与经济单位。

变化 5：母系社会变成了父系社会。

变化 6：财富私有制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贵族。

变化 7：人开始由集体中的一员变成了集体中独立的个人。

变化 8：社会由分散开始走向整合与统一。

史前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所有的血缘组织都是独立分散的小型社会组织。因此，人类社会文明化最重要的特点与标志就是社会的一体化，即整合与统一。

八大变化的意义表明，文明的起源，社会的文明化，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迎接国家的起源；文明是人类自身追求高品质生存状态和质量的举措与结果。

第二章：质疑“考古学文化”的神话

王巍、赵辉先生说：“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

在这里，“考古学文化”被神话了。“考古学文化”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实体，一种人类的社会组织，各个“考古学文化”还带领自己的属民一起来搞文明起源！？

但是，考古学文化是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考古学文化只是一种死的“物质文化”的共同体，不是活的人类的社会组织。

在夏商周国家、民族、考古学文化“三位一体”现象出现之前，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地域范围内分布了无数个血缘组织，以及众多“古国”；所以古人只认血缘，只认组织，不认考古学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东文化大举北上，欧美文化大举东来，但是所有这些物质的非物质的影响和交流都没有共同“演进”出新的“文明”。

“考古学文化”最主要的学术意义，一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科学的时空坐标，二是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

因此，考古学文化不是人类组织，考古学要透物见人就必须以人类的社会组织为历史发展演变的平台，为历史研究的平台。

第三章：质疑“区域聚落形态”

王巍先生说：“出于为中心聚落中的显贵们服务的需要……卫星聚落一般都位于中心聚落的周围……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点。”

但是，在国家出现之前，整个史前社会都是血缘社会，到处都是小型的血缘组织，根本不存在地缘化的“区域聚落形态”，以及地缘化的“中心聚落”和“卫星聚落”。

“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主要由四个问题。

一是没有区分自然和社会原因促成的聚落群聚形态，而是混为一谈。

二是将地缘社会的“社区”、“社群”强加在古人头上。史前是血缘社会，所有的社会组织都以血缘为纽带。在古国出现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跨血缘跨地域并以“社区”“社群”为组织单位的“区域聚落形态”。

三是“区域”都是人为圈定的，越大越好，5~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聚落都不宜被看作“区域形态”。

四是认为区域内有“四级聚落等级”就有国家，哪个大哪个就是王。

正因此，区域聚落形态的根本问题就是用人为了虚构的历史模糊了、架空了史前社会的原始形态和真相。

“良渚古城址”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调查表明，良渚遗址群是一个史前独立的近距离相聚在一起的大型聚落组织，既不是“区域聚落形态”，也不是地缘化的国家；所谓“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国野、城址区、郊区、王陵、贵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的划分与认识，都是地缘社会，即商周以后才陆续出现的历史现象，全部被人为提前了二千多年。

第四章：质疑“酋邦”

“酋邦理论”的核心思想：一方面认为酋邦是人类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

对此严文明、李伯谦先生都认为中国史前有“酋邦”，其中“良渚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就是代表。

但是，中国的考古表明“酋邦”理论有二个重大问题。

（一）中国就根本没有“游群”，也没有独立的“游群”时代

距今约 200 万年以前，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群聚形态就表明它们是一种有组织的形态。

其中，同为一个遗址群的飞梁与东谷坨二遗址，不仅相距很近，约 400 米；而且各自厚达几米的同时期文化堆积层，说明它们都不是孤独的“游群”，而是同一个组织的不同成员。

（二）中国就根本没有“酋邦”，也没有独立的“酋邦”时代

距今 6-5 千年崛起的是血缘一体化的聚落群（部落）。

特点：以实力和利益为基础，以聚落为组织单位，各成员之间主从关系明确，并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A 型聚落群：分散不同的聚落遗址的一体化。各成员近距离相聚在核心的周边，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所在就是代表。

B 型聚落群：同一个遗址不同聚落的一体化。各成员零距离相聚在核心的周边，河南郑州西山城址所在就是代表。

距今 5-4.5 千年崛起的是血缘一体化的聚落群团（永久性的部落联盟）。

特点：以实力和利益为基础，以聚落群为组织单位，各成员之间主从关系明确，并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A 型聚落群团：分散不同的聚落群的一体化。各成员近距离相聚在核心的周边，湖北京山屈家岭大型环壕遗址所在就是代表。

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城址时期的聚落群聚形态也是 A 型聚落群团的代表。

B 型聚落群团：同一个遗址不同聚落群的一体化。各成员零距离相聚在核心的周边。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所在就是代表。

距今 4.5-4 千年，同时崛起的是一体化的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和古国。

聚落集团：超大型的血缘聚落组织。

特点：以实力和利益为基础，以聚落群团为组织核心，从属关系扩大到各聚落群团之间，各从属组织近距离或超近距离相聚在核心的周边。

A 型聚落集团：核心周边既有聚落群团又有聚落群。湖南澧县鸡叫城城址所在就是代表。

B 型聚落集团：所有组织成员都是聚落群团。山东西北东阿教场铺城址所在就是代表。

C 型聚落集团：所有组织成员都是早期同一组织一脉相承原地发展壮大结果。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就是代表，并以城址为核心，在 8 平方公里范围内聚集了 38 个聚落。

早期国家：一种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结盟的聚落组织。

特点：以实力和利益为基础，以聚落群团或集团为组织核心，从属组织完全是不同血缘的聚落群团或集团，并近距离相聚在核心的周边。

A 型早期国家：只跨血缘。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就是代表，其中吴刘新场附近的聚落群团就是外来的组织。

B 型早期国家：又跨血缘又跨地域。山东青州寿光以边线王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聚形态就是代表，其中青州与寿光境内都是独立的聚落集团。

古国：一种又跨血缘又跨地域，并在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聚落组织。由于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血缘组织，所以古国又可称为“血缘国家”。

A 型古国：单一血缘组织单打独斗建立古国模式，并与高代建国模式类似。

山西临汾盆地澧河聚落集团打败陶寺古城及其聚落组织建立古国就是代表。

B 型古国：先跨血缘建立早期国家，然后再建立古国，建国之路类似西周。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就是代表。

C 型古国：先跨血缘又跨地域建立早期国家，然后再建立古国，建国之路类似夏。

河南洛阳盆地洛河以南三大聚落集团联合打败敌人轮流执政共同兴旺发达的过程与结

果就是代表。

显然，中国史前血缘社会向国家地缘社会的过渡不是“酋邦”所能涵盖的，而是更具体、细致、更具有本土特色。

第五章：质疑“社会分工”的神话

袁行霈、严文明认为：“社会分工方面一系列的联动：首先是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分工……都将导致一种具有权威的强制力量的出现，这便是今天称之为国家机器的东西。”

王巍先生也认为：“在交换和贸易比较发达地区，中心聚落还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它们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方，如靠近河流和主要的道路。”

显然，在专家们的认识里，史前晚期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分工不仅发生了；还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催生了地缘性的商品经济和贸易中心，另一方面成了导致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基本原因。

但是，商品经济与农业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是有条件的。

第一，社会地缘一体化。否则，就不可能在不同的人类血缘组织之间实现农业与手工业无限制的“社会分工”，有产品也无法流通。

第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否则，产品都是集体的，有产品也不可能变成可随意销售与自由竞争的商品。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手工业分工又分级现象说明，史前晚期，社会没有地缘一体化，各血缘组织自产自用；所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社会分工”只发生在大型一体化的血缘组织内部，并服从统一领导与管理，根本没有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

事实上，商代及以前，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全部都只发生在血缘组织内部，并随这种组织规模的扩大而扩大。商代之所以会出现“世工世族”、“工商食官”就说明当时还没有出现只为销售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

其中，殷墟就不是“贸易中心”，并说明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与农业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完全无缘。

希望

对苏先生的纪念不是形式，而是不断地创新与进步；希望北大摒弃自以为是的学术官僚做派，兼容并蓄，不再跟在别人的后面，而是接过“中国学派”的大旗，扛下去。

苏公，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